
选调与任用：解放初期入浙南下干部研究

包晨岚^{*1}

【提要】：南下干部是解放战争后期中共进军南方国统区过程中，为解决干部缺乏问题从北方大量抽调干部而产生的群体。南下干部相比浙江地方干部，由中央选调，并在南下后成为浙江党政军机构各层级权力的中心，对浙江在解放后的经济和政治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分析入浙南下干部的选调与任用可了解山东干部在被动员南下时的行为和心理状态，以及组织动员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可由此出发考察中共对南下干部的调配与政权的建构。

【关键词】：南下干部 浙江 选调 任用

近些年，与山东南下干部有关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在延续南下干部决策、组织等相关背景性梳理的同时，研究有所深化。但是，关于入浙南下干部的研究则相对阙如。中共建政初期，浙江干部主要由南下干部、浙江地方干部、解放军干部组成。其中入浙南下干部的选调与任用，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的一蹴而就的过程。深入地梳理和研究入浙南下干部选调与任用问题，能够丰富对入浙南下干部群体的认识，对这一群体有更为准确的把握，同时也可以加深对组织动员过程和政权建构的理解。

一

由于解放战争进展之迅速，从1948年9月起，随着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相继以解放军的胜利而结束，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处于解放军的直接军事威胁之下，中共对长江南岸以及西南数省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占领与接管被提上了议程。

1948年底中共党员人数为450万，^[2]约占当时全国人口比例的1%，但是，此时其党员主要集中在北方的一些根据地和部队中，在广大的新占领区内，党员人数十分有限，这对面临占领与接管南方广大区域的中共来说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中共从弥补城市中党员数量不足的立足点出发，早在1944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中就培养和任用当地的党员干部作出了指示，在各种干部中，要特别注意培养各城各路的当地干部，外去干部应把自己当作当地干部的引路者与保育者，并让当地干部在新方针、新方法下工作。^[3]此指示表明中共在自身具备较强实力的区域，准备争夺日军控制下的城市，而此目标的达成需要城市中共地下党的配合，因此地方干部是可以被任用并担当要职的。^[4]然而，1949年中共面临的全国局势与1944年全然不同，中共高层与浙江省委对于南方地方干部的任用问题已有新的指示，“在一般干部的配备原则上应以正规军的干部及南下干部负责主要的领导工作，因为他们多年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之下，对党的政策比较了解，对解放区的建设比较有经验。”^[5]这说明在1949年之前，南方大多数城市均为国民党统治，中共的力量相对弱小，在最后夺取城市的过程中，主要依靠的是中共军事力量的渡江南下，地下党大多起辅助作用，这一点在南方中共地方政权的组成上也有明显反映。

浙江作为新解放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一直以“模范省”自居，处于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域。更为关键的是，中共在南方的政权基础较弱，自红军长征后，中共的革命活动主要集中在北方，南方除了少数的几块根据地与一些城市里的地下党外，缺乏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力量。叶剑英对广东的情况分析也适用于浙江，南方“长期在反革命势力统治下，孤悬敌后、远离中央，党的影响不普遍，人们对我党我军的奋斗历史模糊，缺乏热烈拥护和衷心爱戴的思想自觉”，^[6]在这个区域上的胜利是主要由军事力量造成的，与以往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模式不同，此时是先占据城市，再将统治力量推向城市周边的乡村，这是原先这些地区中共势力薄弱所导致的，也是南下干部在接管浙江后又将工作重心从城市移往农村的原因所在。^[7]因此，南下干部入浙后的任务十分艰巨。

¹ 作者：包晨岚，浙江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杭州 310028

浙江解放前，中共党员数为 44263 人，^[8] 相对于 1949 年浙江 2021 万的人口数量而言，^[9] 44263 人的浙江地方党员数量约等于 1:456 的比例数，浙江地方干部与浙江人口的比例数则更低，干部数量的缺乏使得接管工作如完全交由浙江地方干部来进行是难以有效完成的。即使在南下干部接管浙江后，许多地方仍旧出现缺少干部的情况，如宁波地、市委共缺干部 1519 人，其中区以上干部 429 人，一般干部 1090 人。^[10]

相较而言，入浙南下干部的主要来源地——山东无疑具备了大规模抽调干部的条件。这与山东根据地在抗战时期形成的基础以及抗战后浙江的军事部署有关。与抗战时期国民党主力部队在山东的不断退却相反，中共在山东的控制范围不断扩大，至 1944 年底，山东根据地人口达到 1600 万，中共部队发展到 15 万，民兵超过 35 万人。到 1945 年年中，鲁中区行署控制的区域已经超过了它在 1942 年成立时控制的范围。早在 1945 年 8 月 13 日，在原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的山东省政府是中共领导下的第一个省政府。抗战胜利后，华中局与山东分局合并成立了中共中央华东局。1949 年 3 月，华东局领导机关南下后，中央在山东地区又重建了山东分局。山东根据地在解放战争初期对解放军在大江南北的作战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并且山东根据地作为华东区域解放较早的根据地，有着较为深厚的军事、群众基础，到 1949 年，山东全省党员达到 75 万人。^[11] 1949 年 4 月，即在中央第二次大规模调派干部后，根据华东局组织部的统计，“原有干部 96968 人，今年新提拔刚脱离生产干部 36913 人，这次南下 22968 人，现在尚有 102913 人”。^[12] 从区位优势上看，在日本投降后中共军队占据着山东大部与江苏、河南、安徽三省边界部分区域，区位优势显著，山东相较北方其他省份又与浙江距离较近。同时，在抗战胜利后，浙东区党委和苏浙军区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部署撤离浙江，除留下少数干部坚持根据地外，军队和所有党政干部于 1945 年 9 月底至 10 月北撤山东，^[13] 由此可知北撤山东的苏浙军区部分部队与浙江渊源颇深，这对占领与接管工作而言是一个有利的条件。因此，由山东承担调配干部南下的重任亦是情理之中。

二

基于北方党员数量较多，人员较为集中，浙江地方干部数量的缺乏以及南下干部相比南方地方坚持干部更受中央信任，因此调配北方干部南下接管成为此一时期的干部政策。中共中央于 1948 年 9 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强调了为夺取全国政权所需的干部准备工作的必要性与紧迫性。^[14] 10 月 28 日，中共中央根据“九月会议”的指示，做出了《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决议》估计了在解放战争第三、四年内解放军可能占领的国民党统治区域以及区域内的人口数量和相应所需的干部数量，大致共需中央局、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等五级及大城市的各项干部 5.3 万人左右，并将抽调干部的任务作了分配，其中华北 1.7 万人，华东 1.5 万人，东北 1.5 万人，西北 3000 人，中原 3000 人。^[15]

根据《决议》中估计干部数量的方法，浙江省在 1949 年底共有县委(市委)84 个，^[16] 《决议》中提到的“每一个新开辟县，至少需要县级及区级干部七十五人左右”只是理论上的估计，而“在老解放区，平均每县脱离生产的干部，包括村级干部在内，约有二百至三百人，最大的县有多至四百人者”是较为接近实际的干部需求数，^[17] 因此按照最低干部配备要求，接管一个新开辟县也需要 200 人，因此浙江需要县级干部 16800 人，地委级干部至少需要 1008 人，区党委至少需要 240 名干部，总计至少需要 18048 名干部，而且其中还未包括杭州市军管会各部门的干部需求量。同时，安排给省委 240 名干部是远远达不到工作所需的。

关于华东局如何贯彻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的决议以及山东各区在接到华东局的指示后所展开的干部动员、抽调、思想教育等情况，在岳宗福、刘大可等人的文章中有论述，在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的《山东南下干部入浙》一书中亦都有涉及，在此不再赘述。但是，对于山东入浙南下干部的选拔标准以及南下干部入浙后与地方坚持干部的数量比较等问题，有关研究文章都未有提及。关于选拔标准问题，可以参考中共中央发出的两个关于从中央各部委抽调干部南下的通知。这两份通知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于 1949 年 6 月发出，其中对南下干部的选拔要求有几个共同点，“身体健康，能长途行军者(如系女干部则不得携带小孩子，且非孕妇者)；一般应为区级以上干部；对于没有参加工作的南下干属，应由其原机关负责照管，俟新占领区稳定后再分别送往”。^[18] 对于南下干部与地方坚持干部的数量比较情况，下文将作出论述。

通过对拟提拔干部的选择标准进行分析，在有计划的大量培养训练和提拔干部中，要选择工作好，立场稳，执行政策路线正确，党性坚强，作风正派的干部。南下干部的选调标准与南下干部入浙后对其的评价也能相互印证，南下干部的特点是“一般群众经验丰富，立场较稳，阶级界线较严明，政策水平较高，艰苦，踏实，积极”。^[19]入浙南下干部的选拔标准，既包含了中央发给各部委的抽调选拔要求，还包含了政治立场与工作水平的要求。

山东解放区自接到山东省委的命令后，各区行动十分迅速，从组织发动到最后确定南下干部的名单，只用了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到1949年2月，全省各区已基本完成省委交给的抽调干部的任务，山东实际南下干部数量达到22968人，超额7968名完成了中央任务。^[20]

山东调配干部南下取得成功，并且超额完成目标，为中共接管南方数省新占领区做好了组织准备，为有效实现政权接管、平稳过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组织动员的过程，为各层级党委了解干部情况，合理调整与任用干部提供了条件，也为原有党政军组织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21]但是调配行动是在战争环境下进行，规模又大、时间又紧，且与整党、土改等各项工作交织在一起，因此在选调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有些干部有怕远走、怕离家、怕艰苦、怕危险的思想，因之以各种借口，甚至提出无理要求，回避与拒绝调动，在留下的干部中，有不少干部仍存有怕再次南调不安的思想。^[22]

三

1949年2月在徐州贾旺召开的中共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由粟裕代表陈毅司令员传达了军委指示，为渡江南下作了具体部署，下达了京沪杭战役的预备命令，对各兵团渡江后经营新区的任务作了明确分工：七兵团兼浙江军区，经营浙江；八、九兵团警备上海、南京；十兵团兼福建军区。在这次会议上，决定由三野第一副政委谭震林负责指挥由第七、九兵团的7个军组成的中集团，并兼任七兵团政治委员。同时，建立了由七兵团政委谭启龙领导的“浙江省准备委员会”，负责调配、培训随军南下的干部。谭启龙负责筹备接管浙江的组织实施，主要是把华东局从山东调浙江工作的南下干部带到浙江，做好分配工作。

1949年4月21日，国共和谈破裂，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4月23日占领南京。大军过江后谭震林接到中共中央军委关于七兵团进杭州，接管整个浙江的命令，而后大军向浙江进发。^[23]谭震林和七兵团主要领导在5月4日抵达杭州。同日，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军区。6日，中共浙江省委成立，谭震林任书记，谭启龙任副书记。7日，杭州市军管会成立，谭震林为主任，谭启龙、汪道涵任副主任。

负责接管浙江的是“南下干部纵队”一支队和三支队，主要有先遣纵队财办的1051名，鲁中南区的4656名和渤海区的2877名，共计8584名。^[24]

南下干部于1949年5月入浙。5月15日，省委召开南下干部各大队负责人会议，由省委书记谭震林主持，省委副书记谭启龙做“浙江省情况和接管任务”的报告，省委组织部部长杨思一布置了工作任务。随后，南下到浙的干部就分往各地，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的“按照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步改造”的接管方针及浙江省委确定的“迅速分配干部，实行战略展开，集中干部接管城市，保证不乱，完成会师，了解情况”的方针作为接管初期的主要工作投入到了浙江的接管和建政工作中。^[25]

南下干部在进入浙江后，接管地方政军大权，因其对中央的依赖，且多年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解并能迅速贯彻中央的政策，并经历过战争、土地改革、整风等各项运动的考验，因此相较南方省份的中共地方干部更受到中共中央的倚重，由此南下干部入浙后处于各级权力的中心地位。

在南下干部入浙之初，各路干部的团结关系到省委能否迅速打开工作局面，关系到能否顺利接管政权及协调军队的统一行动。经过省委的一系列细致的工作，会师中的团结问题得到了比较妥善的解决，谭震林后来回忆在浙江的三年工作时说：“虽然浙江的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各有山头，各有一套作风，而在三年中始终是团结的”。^[26]入浙南下干部往往能顾全大局，自觉的

注意与地方干部的团结问题，坚决的服从命令，如三支队四大队南下干部，从调配南下起，紧密与主力部队配合，每到一地即积极开展各项工作，为后续部队筹集粮草，供应部队需求，顺利完成渡江支前的艰巨任务。渡江后，原本分配四大队接管上海，接华东局通知后又转调杭州，但此时杭州接管干部已有安排，中共浙江省委决定他们接管温州，而此时温州已经解放，原浙南坚持革命斗争的当地干部已在开展接管，省委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四大队留一部分在温州工作，另一部分调往丽水参加接管。四大队的干部南下过程中即一路辛劳，渡江后又上海不留到杭州，杭州不留转温州，温州之后又转丽水，转战数千里，不计较个人得失，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为建立和巩固新解放区作出了巨大的牺牲。^[27]

南下干部入浙后，便与各路干部一起着手接管与建政工作。“八千个南下干部，这是经过了长期锻炼，经过了土改、三查、加强纪律性所锻炼出来的干部，他们对于党的政策是比较了解的”，^[28]他们其中有许多是专门从事党务、军事、政府、民运、经济、文教等各个方面工作的，都有一定的领导能力及工作经验，是浙江接管和建政的主要力量。浙江解放后的接管工作在短期内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全省至1949年8月中旬，已基本完成接管、干部分配与战略展开三项任务，总计接管国民党党政机关和官僚资本企业502个，解散了国民党的一切政治性组织。^[29]

同时，南下干部积极参加各级党委组建的工作队，响应党委号召去往农村，虽然农村地区土匪多、特务多，但南下干部一面配合部队剿匪，一面发动群众生产救灾，虽然藏匿在农村的土匪使南下干部时常受到生命的威胁，^[30]然而经过工作队艰苦的工作，至8月底，已彻底扭转“我占城市，敌占农村”的情形，更是为锻炼造就一支干部队伍打下坚实基础，“全省工作队人数发展到3万人，其中南下干部有7000人”。^[31]

此外，南下干部积极克服初入浙江语言不通，与民众接近困难及与浙江地方干部生活习惯不同的问题，并在原则性与纪律性上不仅依旧高标准要求自己，也督促地方干部提升纪律观念、坚定原则立场。^[32]

在南下干部与地方坚持干部的数量比较上，南下干部具有一定的优势。浙江省在解放前有中共党员44263人，解放后，到1949年9月有51276人，但这个数据缺乏七地委及省直属机关的党员人数。^[33]根据《中共浙江省委组织史资料》的数据，浙江解放后全省党员人数为51590人，这个数据包含了七地委的党员人数。^[34]在解放前的44263名党员中，干部数为3000余名；^[35]1949年9月全省党员51950人中有干部13000余人，^[36]即是在浙江解放后党员人数增加了7687人，而干部数则增加了10000余人。因此，中共入浙后除了发展了一批非党人员为干部外，外来党员绝大多数都是以干部身份进入浙江进行接管工作，在干部数量上，南下干部确实占优。

四

南下干部的功绩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南下干部在进入浙江后，接管浙江党政军大权，对于建立和巩固新民主主义政权、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开展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等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37]政权的平稳过渡，一个由上而下的高度集中的政权体制的构建，这为新解放区日后各项运动的开展及国家战略目标的实施奠定了基础。

同时，“南下干部”研究对当代有着广泛的借鉴意义。入浙南下干部大都是在山东已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他们刚从战火硝烟中走出，生活即将步入正轨，很多还有妻儿、父母需要照顾，但他们毅然响应党的号召，不计个人得失，践行着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南下到一片陌生的土地，面对着未知的危险；入浙南下干部的南下征途辗转前行，接管、征粮、发动群众、频繁调动，但他们亦无怨言，有着铁一般的纪律，组织观念强，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信念坚定，百折不挠；中共所处的地位与国内外环境在不断发生变化，这就对中共的执政能力提出了考验，相应地，也就对干部的种类及专业化程度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进行干部管理体制的创新成为中共自身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南下干部在南下前处于物质条件和商品经济较不发达的农村环境，而南下后则处于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环境，如何不被糖衣炮弹所打倒，经受住商品经济的考验，对于反腐中制度先行理念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此外，南下干部所代表的“南下”这一行为的意义是重大的，就中共而言，它代表了中共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的转变。

当然，从今天回头看，南下干部也有其历史局限性。以“阶级出身”作为选用干部的重要标准，长此以往所造成的阶级歧视将给社会带来严重的问题；南下干部入浙后对浙江地方干部的任用产生了一定的冲击，虽然总体而言团结问题解决的相当不错，但摩擦与隔阂在短时间内亦未完全消除。

注释：

[1]关于南下干部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决策、组织、调配、派遣等方面，参岳宗福：《接管政权：中共大批干部下江南》，《党史博览》2004年第4期；刘大可：《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南下干部的组织调配与派遣》，《东岳论丛》2014年第6期；闫峰、王兆辉：《建国初期“南下干部”纵队组建的历史环境》，《党史文苑》2008年第2期；唐传喜：《南下战略与南下干部的历史贡献》，《理论学刊》2012年第8期。

[2]《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1950年5月21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42页。

[3]《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1944年6月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18页。

[4]金延锋：《当代浙江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24页。

[5]《省委关于结束前浙东临委工作的决定》，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浙江省档案馆：《中共浙江省委文件选编》（1949年5月—1952年12月），内部印行，2011年，第4页。

[6]叶剑英：《整顿内部纪律，健全机构制度》（1950年2月11日），《在广州市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1951年4月1日），广东叶剑英研究会等编《叶剑英在广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38-139页。

[7]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浙江历史》（第二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40页。

[8]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浙江省组织单位及党员统计表》（1949年9月），浙江省档案馆，档案号：J003—1—6。

[9]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浙江省组织单位及党员统计表》（1949年），浙江省档案馆，档案号：J003—1—6。

[10]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宁波地、市吸收干部的初步意见》（1949年），浙江省档案馆，档案号：J003—4—29。

[11]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山东地方史》（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62页。

[12]《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组织部关于抽调一万五千干部随军南下任务执行情况的补充报告》（1949年4月29日），山东省档案馆：《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2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94页。

[13]金延锋：《当代浙江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19页。

[14]《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1948年10月10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47页。

[15][17]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集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426—431页。

[16]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浙江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9页。

[18]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从中央各部委抽调干部去南方工作的第一号通知》(1949年6月29日)，江西省委组织部：《组织工作文件汇编》(1945.8—1949.9)，第237-238页。中央组织部：《关于从中央各部委抽调干部去南方工作的第一号通知》(1949年6月29日)，江西省委组织部：《组织工作文件汇编》(1945.8—1949.9)，第238-239页。

[19]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九个月来全省干部思想作风情况及组织情况汇报》(1949年)，浙江省档案馆，档案号：J003—1—20。

[20]《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组织部关于抽调一万五千干部随军南下任务执行情况的补充报告》(1949年4月29日)，山东省档案馆：《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2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93页。

[21]刘大可：《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干部南下的组织调配与派遣》，《东岳论丛》2014年第6期，第89—90页。

[22]《中共冀南区党委关于贯彻整顿干部思想及解决南调遗留问题的通知》，中共德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光荣的使命》，党建读物出版社，2001年，第396页。

[23]《七、九兵团向东进击的部署》，谭震林1949年4月24日给七、九兵团各军的指示并向总前委、中央军委的报告，转引自谭震林编纂委员会：《谭震林传》，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68页。

[24]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南下干部调动分配统计》，浙江省档案馆，1949年，档案号：J003—1—005。

[25]谭震林：《浙江解放以来九个月工作的基本总结与一九五〇年党的任务》(1950年3月3日)，浙江省档案馆，档案号：J002—998—195001—007。

[26]转引自谭启龙：《谭启龙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第232页。

[27]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三支队四大队随军南下简史》，内部刊印，1999年，第4—5页。

[28]谭震林：《在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49年9月20日)，《中共浙江省委文件选编》(1949年5月—1952年12月)，内部刊印，2011年，第78—79页。

[29]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浙江历史》(第二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14页。

[30]《浙江老年报》，2009年7月17日。

[31]谭启龙：《谭启龙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第342页。

[32]杭州市军管会：《谭政委在杭州市军管会成立会上的报告(记录稿)》(1949年)，浙江省档案馆，档案号：J23—1—1—1。

[33]《浙江省组织单位及党员统计表》(1949年9月)，浙江省档案馆，档案号：J003—1—6。

[34]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等：《中共浙江省委组织史资料》（1922.4—1987.12），人民日报出版社，第845页。

[35][36]《浙江省中国共产党志》编纂委员会：《浙江省中国共产党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93、189页。

[37]丁龙嘉：《论“南下”与“南下干部”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及当代价值》，《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期，第78页。